

人才培养是大学最重要的工作，教学应当是教师的天职。但学校教育绝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。韩愈说，“师者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梅贻琦校长指出：

“学校犹水也，师生犹鱼也，其行动犹游泳也，大鱼前导，小鱼尾随，是从游也，从游既久，其濡染观摩之效，自不求而至，不为而成。”

可见，教师之于学生，除了知识传授，还有人格涵养和能力培养；并且，后两者比前者更为重要。但在学校日常训练中，三者又都通过教学来进行。

清华自建校起，就建立了以严谨严格为核心的优良的教学传统。严谨严格，不仅表现在教学方法和要求上，也表现在教师对教学的极端负责。极端负责，不仅仅表现在上课严守时间和对教学内容的精益求精，也表现在不以学生多寡来决定时间和精力的投入。在清华历史上，不乏出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课堂的情形，老师们上课依然严谨认真，留下了不少佳话。

一个学生的课堂

■ 金富军



1922~1923年，梁启超在清华讲《国学小史》。由于梁启超的广东口音，以及排课时间等原因，听讲人数逐渐减少。有一次甚至只有五个人听课。“但是梁任公从不因为听课学生人数的多少而影响他教课的热忱。”

1934年，有学生在《教授印象记》中栩栩如生地描述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上课：

“陈先生在清华担任的课程有劳工问题、人口问题、社会立法等。选这些课程的，除了社会系的学生外，很少别系的人。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比较枯燥的关系吧。然通夫先生决不因为教室太大，而稍减他的热心，他永远是摇铃就走上讲台，非到下课时间是不走的。一年来在三院十二号教室里，往往只有我一人听课，他还是一直讲五十分钟，不肯一刻偷闲。”

王力教授上课认真负责，他的夫人回忆：

“他每次讲课回家，嗓子都哑了，我心疼他的辛苦。一次，我特意走过他讲课的教室（当时的“一院”），听见他在高声讲课，我想一定有



1937年清华社会学会，前排右3潘光旦，右4陈达

很多学生在听课。我踮起脚尖向窗内望，不觉大吃一惊！原来只有三个学生！他却绘声绘色地讲授着，边讲边写黑板。回家后我问他：‘只有三个学生，你何必那么认真？’他回答：‘教师讲课认真，有精神，学生才能聚精会神地听课、记笔记。’”

梁启超、陈达、王力等教授极端负责的教学精神，实际上是对教师职业的敬畏，是一种极强的事业心。在朱自清先生那里，这种职业敬畏和事业心，就是对教育的信仰。朱自清在《教育的信仰》一文中写到：

“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的人格，这已成了老生常谈了。但要认真培养起来，那却谈何容易！第一教育者必须有‘培养’的心，坦白的、正直的、温热的、忠于后一代的心！……教育者必须有健全的人格，而且对于教育，须有坚贞的信仰，如宗教信徒一般。他的人生的理想，不用说，也应该超乎功利以上。……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

信仰心，如宗教徒对他的上帝一样；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，尤须有深广的爱；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，任劳任怨。……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！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！我愿我们都努力，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。”

正是因为把教育作为信仰，并且是近乎宗教徒对上帝那样的信仰，朱自清对教学表现了极端的负责。即使在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时期，朱自清仍克服种种困难，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。他在讲《中国文学史》时仍坚持让学生定期交读书报告，还认真给学生改笔记。朱自清反对那种只顾教师个人学术研究，不肯为学生花工夫批改作业的态度。他说：“文化是继续的，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，如果都不肯替青年人服务，下一代怎么办？”他开的新课《文辞研究》虽然只有一个人选课，他也按时上堂讲课，从不缺席。有时候，朱自清是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来忘我工作的。他的夫人陈竹隐回忆：

“在云南蒙自和昆明的时候，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，生活也很困难。但佩弦仍是兢兢业业地工作，每天仍是夜里十二点钟以后才休息。对学生严格要求，对自己毫不放松。他工作起来仍是说到做到，一点也不容拖延。有一次佩弦得了痢疾，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，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。我劝他休息，他只是说：‘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。’他书桌边放着马桶，整整改了一夜作文，拉了三十多次。天亮后，我



中文系 1948 级毕业生合影。第二排左起第二人为许维通，向右依次为余冠英，冯锺芸，朱自清，浦江清，陈梦家，王瑶（右起第二人）。第三排左第四人为季镇淮，第六人为朱德熙，第七人为李广田。汪瑞华 2006 年 8 月提供。

看他脸色蜡黄，眼窝凹陷，人都变了相。而他却脸都没洗，提起包就去给学生上课了。……他对教学更是一丝不苟，认真负责，给学生改作文都是字字斟酌的。有一回他给一个学生的作品改了一个字，过后他又把那个学生找来说：‘还是用你原来的那个字吧！我想还是原来那个字好。’”

极端认真负责的教学，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上述几位教授为代表的清华教育传统。在这后面，还有他们对教学完整内涵的认识。那就是上课教学，不但要教学生知识，也要培育学生人格，也促进自己学问事业的发展。

梅贻琦指出：

“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，如何研究学问。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，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，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。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，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，不偷懒，不作伪，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。”

可以说，教育学生，不仅是知识的，也是人格的。教育不仅是手段，也是目的。

朱自清就认为，教育者不能将教育视为手段，而应该看做目的；将教育看做目的仍然不够，还不能太功利，在教授知识同时，也要塑造学生品格。他认为：

“教育被压在沉重的功利下面，不免有了偏枯的颜色。我总觉得‘为学’与‘做人’，应当并重，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。现在一般号称贤明的教育者，却因为求功利的缘故，太重视学业这一面了，便忽略了那一面；于是变成了跛的教育了。跛的教育不能行远，正如跛的人不能行远一样。”

朱自清指出，教育者都知道学生的学识是不完足的，实际上学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。“其实‘完人’是没有的；所谓‘不完足’，指学生尚在‘塑造期’（Plastic），无一定品格而言；——

只是比较的说法。”“学生们既要学做人，你却单给以知识，变成了‘教’而不‘育’，这自然觉得偏枯了。”

美国教育家迈克尔·约翰 1927 年辞去阿默斯特（Amherst）大学校长职务，到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创办实验学院，为的是：“竭力主张学生要和教师亲近，以启发好学的精神，改变务外的心理。他的计划，也就是作教师和学生同处的安排。使他们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员，过着共同的生活。教师遂能根据对于学生的相当的了解，本着亲切的友爱来领导他们，向着光明的路途走去。”在清华，固然没有类似实验，但陈达、王力、朱自清等教授对教学的投入，却实现了迈克尔·约翰的实验目标。

正是对教育有着这样完整的理解，清华大学才能得以建立并传承极端重视教学的传统。身教重于言教，这种人数极少以至于只有一个学生的课堂，教师仍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上课态度，对学生的教益，可能超过课堂上传授的知识本身。知识可以过时，但精神永续。多年以后，老师上课讲的知识可能会淡忘，但老师伟岸的身影总能深深印在学生心中。正如前述描写陈达教授上课情形的学生写到：

“有时我真觉得惭愧，现代的青年人太不长进了，这样大的社会问题没人肯去研究，不怕招引热心于社会问题的前辈的失望与不快，提倡者尽管热心，但如反响者太少，也是极无聊的。”

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校规模发展，课程的开设成本也提升很快。现在，这样少数甚至一个学生的课堂越来越少了。从经济上看，这自然有道理。但从知识传授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看，在显性成本核算与隐性人才培养之间，如何找到合理的结合点，值得我们思考。

（作者为清华校史馆副馆长）